



算盘声里的教诲

◎彭常青

如果你问我1到100的和是多少,我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:5050!

是的,5050,肯定不会错,这个数字从小就深深植根在我脑海里。说起来源于我的父亲,早年从事金融工作的他,是一个算盘高手。我常看见父亲端坐桌前,手执算盘,快速准确地进行复杂计算,整个人就像一台精密机器,让人不禁感叹他的聪明和能力。

尽管彼时父亲算盘的段位已经很高,闲暇时仍不忘坚持练习。只见他双手在算珠上轻轻滑过,左右开弓,仿佛在琴键上弹奏一首无声乐章。“噼里啪啦”不到一分钟,两边都能准确显示结果,丝毫不差。然后再倒着减

回去,一直到0,从不出错,让人叹为观止。看着他行云流水的动作,那清脆而有节奏的算盘声,宛如一首悠扬旋律,深深镌刻在我的成长岁月中。

有一天,我忍不住问:“你是怎么做到的?”父亲微笑着告诉我:“熟能生巧!”

我接过算盘,试图模仿父亲的动作,口中默念他教过的口诀,但那些小珠子却像顽皮的精灵不听使唤。父亲总耐心地纠正我每一个失误,他的言辞如春风拂面:“别急,慢慢来,持之以恒,方能有所成。”

父亲的话深深烙印在我幼小的心中,随着年岁增长,逐渐成为我成长道路上的一盏明灯。他不仅教会了我技能,更重

要的是培养了我对学习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。他常对我说:“持续学习,才能不断进步。”这句话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。

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,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向我展示了努力与坚持的力量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养成了自觉学习的习惯,努力追求知识的积累和提升。

每当我在学业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,总会想起父亲在算盘前专注的神情,想起他的教诲,于是便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如今,算盘作为计算工具早已成为历史,父亲也已离开我们多年。但我常会想起父亲,他的笑容,他的手指在算盘上滑过的声音,都深深刻在我心里。

家庭、婚姻与自我

◎杨天天

尽管婚礼只过去了四个月,现在再去努力回忆,脑海中也只能出现零星混乱的片段。和钱老师聊到婚礼那天最幸福的事时,彼此都认定是在婚礼结束后,我们在酒店和来参加婚礼的朋友们聊天至深夜,然后回到家里,煮一大碗水饺当夜宵,边吃边继续聊天。在不算成熟的婚姻经验里,我最大收获有两点:所有宏大事物都会消散于具体而微小的细节之中,以及没有人能在自己的婚礼上吃饱。

当初商议婚礼流程时,我和钱老师一致决定放弃一切例如接亲、父亲和丈夫在舞台上的交接仪式等在我们看来充满物化意味的环节,我们试图抵御关于传统父权话语的种种隐喻,却忽略了走进婚姻本身,就意味着主动进入一种话语结构之中。从社会学意义上讲,婚姻是两个人组建家庭的第一步,但从世俗角度看,只有我们单薄的两个人,还远不能被称为家庭。家庭意味着将各自背后千丝万缕的关系交织在一起,然后生出新的枝芽,互相缠绕。或许这是我们交出彼此一部分自我的第一步,当我们决定踏入婚姻时,我们就必须主动放弃、交付。有趣的是,传统语境中习惯将丈夫或妻子

称为“另一半”,仿佛如同太极阴阳图,只有拼凑起来才能圆满、完整。事实上,无关结婚的对象以及婚姻的状态,正如狄纳斯坦在《美人鱼与人鱼怪》中所说:在我们足以断拒一切恶性协作形式之前,男人和女人都将是半人类的,畸形的。深入婚姻之中,在感受爱与幸福的同时,也时常有那样的瞬间,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自我的消弭。

和钱老师结婚前,我们谈了六年恋爱,从本科到读博,彼此见证了创作和学术上几乎所有的重要阶段。不知从何时起,我们开始称呼对方为X老师,以一种戏谑的态度来消解时常经历的颗粒无收的尴尬时刻。坦然地讲,我们在同一个价值评判体系下所经历的失落和喜悦是相通的,我能真切地共情他所经历的种种压力和彷徨。但同时,在他取得成就时,由衷为他感到高兴之余,我却面临着作为妻子,作为女性,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。

很难具体描述这种感觉,一方面衷心希望对方实现文学理想,另一方面又时刻警惕着这样一个时刻,在同他者的较量中败下阵来,从而被抹去自我。我的丈夫,是我最亲密的爱人和对手,尽管不愿意承认,但我自

始至终都无法摆脱来自内心深处的,与他紧密相连的依赖和对抗。

大约一年前,我在微博小号写道:忘记自己从前的微博密码已经很久了,里面记录了独自出国旅游、和男友异地恋以及一个人在韩国工作生活的日子。那里承载了我的很多情绪,孤独、自由,还有慢慢摸索世界的欣喜。再次重看,感觉是很久远和陌生的日子,仿佛和我的微博密码一样,慢慢也会被忘记,无法再找到。我害怕他人对自我的审视,所以选择用虚构的方式写下关于女性、关于婚姻的故事;同时,我又在不断寻找真正的自我,所以选择了女性文学研究。两者之间的互通性在于,那些关于女性容易被忽略的幽暗意识,正在不断被看见和重塑。而矛盾之处在于,在真实和虚构之间,在理论和实践之间,始终存在一条无法弥合的缝隙。或许寻找自我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,是一场无法判定输赢的较量。而我能够做的,就是时刻提醒自己,警惕一切宏大话语的桎梏,带着对具体事物的热情以及重塑自我的勇气,继续探索这个世界。

最后,愿我们都能努力获得独立、自由、灿烂的人生。

难得糊涂

◎刘伯毅

玉兰
一瓣

作为清朝“扬州八怪”之首,郑板桥在书画界是颇有名气的,他不仅画得好,书法也相当精彩,他的一幅“难得糊涂”,将真草隶篆融于一体的奇特写法,让现代许多人很是喜爱。我想,这不单单是郑板桥这幅字写得妙趣横生,更是这几个字包含的生活哲理让人寻味。

糊涂,是个贬义词,指做人不明事理或分析问题不能由表及里看到本质,每个人都不愿冠上糊涂的名声,或碰上混淆性质的事物。难得糊涂,看上去是一个错误的定义,而郑板桥把它单独提出来,之所以还能成为某些人的座右铭,是因为其义颇深,难以捉摸,里面包含了真假糊涂。

真糊涂是可悲的,因为真糊涂根本认识明晰不了事物的本质,最终导致错误或惨剧。这个世界真糊涂的人或事不少,比如每年被处分或判刑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有数千人。而他们总体上知识水平高,分析问题能力强,为何有时犯糊涂呢?

但郑板桥不糊涂,他当县令时“尝夜出,闻书声出茅屋”,他细心循声而去,打听书生情况,知晓是个叫韩梦周的穷家子弟,三更时还在苦读,就慷慨资助,直到韩梦周考取进士。郑板桥所说的糊涂是一种智慧,一种策略。在郑板桥那个时代,自乾隆十年,“捐纳入仕”即用钱买官出现后,千里做官只为财,成为官场风气与社会时尚,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贪污受贿,徇私枉法已成家常便饭。但郑板桥却立志要做为民作主的清官和明理的好人,特地刻了“畏人嫌我真”“富贵非我愿”等几枚印章表明心迹。他做县令,一上任便在衙门墙上挖出十几个通街的窟窿,要“去前官恶习俗气”。在做潍县县令时遭遇天灾,粮食颗粒无收,导致“人相食”。他生出一计,大兴工役令饥民“就食赴工”,后又开仓,勒令大户赈灾,连自己的薪俸也奉上,虽救人无数却大大得罪了官绅们,最终因为破坏了官场的“潜规则”,而被罢官。

罢官的打击,对郑板桥肯定是大的,在经历一番痛定思痛深层次思考后,郑板桥靠卖字画为生,喜欢写“难得糊涂”书法横幅,既是他自求解脱的戏语,又是受道家人生哲理影响的醒悟。正因为郑板桥以民为本,刚直不阿,面对谗言,遭受打击无能为力时,才会有“难得糊涂”的感叹。“难”在何处?“难”在他毕竟清醒明白,无法对恶势力充耳不闻,视而不见;无法面对百姓疾苦无动于衷,无法对饿死人现象不管;在那个黑暗的官场,面对掌握自己升降甚至生杀大权的上司,也不能一味顶撞,有时需要假装糊涂,然而正如郑板桥自己所言“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”。外表装糊涂,内心真痛苦,因为内心太痛苦了,有时外表糊涂也装得不像,要装得像还需要有一定的策略和心计,所以才有“难得糊涂”之说了,想想也真是啼笑皆非或一声叹息了。

既然郑板桥心如明镜,那么时下为什么有许多人推崇“难得糊涂”呢?我认为,主要是装糊涂,不要顶真。装糊涂的目的多种多样,主要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,或不做恶人。比如当领导的明知下级或子女做了错事,但假装不知道,甚至将错就错任其发展;再比如有人明明看到别人在犯错误或看到某种恶劣事件正在发生,可他们怕惹祸上身就“闭眼”糊涂处之。他们或许以为自己“装糊涂”高明,实际上他们已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原则,甚至把自己推向了犯罪边缘。

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,郑板桥虽然笔下有颓意,但心中是抗争,行为更是不该糊涂时坚决不糊涂。为什么他能做到呢?同是书画大家的金农看到郑板桥画的竹子,曾慨叹:自己画的竹子终不如板桥有林下风度。所谓林下风度,就是隐逸出尘、淡泊名利,说明郑板桥是真名士,他豁达潇洒、崇尚自由,身上有着人性的光辉。